

悲觀主義，而這是農民或工人階級意識的核心內容。客觀地說，這種悲觀主義與其說是一種偏見，不如說是對絕大多數革命國家中工人和農民命運的現實評價。如果說一些國家在創建之前很少發生革命，那

麼，它們現在就更是銷聲匿迹了。有鑒於此，「即便我們不去讚美弱者的武器，也要尊重它」，「我們更有理由看到自我保存的韌性……恰恰是這種精神和實踐，防止了最壞的後果，預示着較好的結果」（頁350）。

悲情的鄉村

● 盧元偉

國家政權向鄉村滲透是二十世紀中國十分重要的現象。中國人意識到，要最終實現富國強兵夢，國家必須加強對社會的控制，整合全社會的力量。而向鄉村滲透政權，改變過去天高皇帝遠的鄉村自治狀態，則是實現這一夢想的必由之路。



張鳴：《鄉村社會權力和文化結構的變遷 (1903-1953)》(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1)。

國家政權向鄉村滲透是二十世紀中國十分重要的現象，其緣起是1903年的清末新政，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所建立的一系列政治經濟制

度，則將其推向了頂峰。國家在這樣的過程中，成為了一個巨大的利維坦，無所不能，沒有任何力量可以對之進行制約，鄉村被緊緊地捆綁在國家前進的戰車上。鄒讜先生在《中國革命再闡釋》一書中，將這樣的一種過程稱之為「全能主義政治」。他認為，近代以來中國所面臨的內憂外患，使其處於一種全面的危機之中：舊的制度被打碎，新的體制尚待建立，整個國家處於支離破碎的狀態，任人宰割。由此，中國人意識到，要最終實現富國強兵夢，國家必須加強對社會的控制，整合全社會的力量。而向鄉村滲透政權，改變過去天高皇帝遠的鄉村自治狀態，則是實現這一夢想的必由之路。張鳴教授在《鄉村社會權力和文化結構的變遷 (1903-1953)》(下引此書只註頁碼)一書中向我們展示了這樣的一個過程。

首先，張鳴通過對一個村圖的論說，向我們展示了一幅傳統鄉村的風景畫。他認為，在傳統意義上，

「鄉紳無疑是鄉村政治的中心，農民自然對這些人有仰視之感，而上頭的政權在處理所有涉及鄉村的政務時，也首先要顧及他們的意思。」（頁8）因此，鄉村基本上是處於鄉紳主導下的自治狀態。當然，國家政權在其中也起一定的作用，但是「鄉紳與國家政權之間的關係，在一般情況下基本上能達到某種平衡，國家默許鄉紳對鄉村某種形式上的實際控制，而鄉紳也盡可能地維護國家的權威，保障國家權力的行使。」（頁39）這樣，鄉村就在鄉紳自治的模式下維持着田園牧歌般的安詳與寧靜，猶如沈從文筆下的邊城，一切都是溫情脈脈的，沒有殘酷的階級對立，也沒有你死我活的鬥爭。

然而自清末新政以來，國家開始了大規模地將政權向鄉村滲透的過程。清末新政通過地方自治的改革，極大地提高了地方自治機關的權力範圍。「自治機關變成了這樣一種東西，凡是從前官府管的它都管，從前官府不管的它也管，鄉紳或者說村社精英的權力第一次不僅被公開化而且制度化了，而且是被朝廷以法典的形式制度化了。……從而在無形之中，國家政權借精英之手將觸角伸到了鄉下，揭開了國家權力下移的序幕。」（頁45）

進入民國以來，無論是北洋軍閥還是國民政府，都無一例外延續了由清末新政所開啟的國家政權下移之路。北洋軍閥混戰，導致了中央政府權力式微，國家政權完全控制在軍人手中。這些軍人政權為了鞏固自己的勢力範圍，徹底撕掉了原來蒙在鄉村身上的那層道德面

紗，對鄉村採取了竭澤而漁式的掠奪。張鳴稱之為「軍刀下的政權下移」。國民政府建立以後，曾一度試圖解決鄉村日益破產的問題，並開出了「鄉村自治」、「保甲制度」的藥方。然而國民政府沒有意識到，近代以來鄉村破產的真正原因，乃是因為國家對鄉村的過份掠奪。因此，這些加強對鄉村控制的措施，其實際效果是進一步加劇了鄉村的衰敗。一些地方實力派，如閻錫山在山西搞「村本政治」、李宗仁在廣西搞「鄉治」，其意圖都是通過加強對鄉村的控制，來鞏固自己的統治。

通過對本書主要內容的論述，我們可以看出，張鳴對於近代以來國家政權向鄉村滲透抱着嚴厲的批評態度。他認為，隨着近代以來國家政權向鄉村的不斷滲透，鄉村變得日益凋敝和破產了，鄉村再也不是寧靜與安詳的桃花源。鄉村精英不斷劣化，由原來的鄉紳主導鄉村政治變為土匪和軍閥橫行鄉間。這對於廣大鄉村來說，可謂一個巨大的陣痛：它打破了鄉村原有的寧靜與安詳，給其權力結構和文化生態都帶來了巨大的破壞。所以張鳴不無痛惜地說：

基層政權和槍桿子有了前所未有的親和，從而極大地損害了農村原有文化氛圍，使鄉村權力從文化性質轉向武化。不僅摧毀了原有的道德氛圍，而且損害了鄉村的文化網絡。在這個打着現代化招牌的軍事化進程中，原有的民間社會空間受到國家政權的全力擠壓和侵蝕，通過這種擠壓和侵蝕，實現國家政權的擴張，最大限度地將農村的資源

張鳴對於近代以來國家政權向鄉村滲透抱着嚴厲的批評態度。他認為，隨着近代以來國家政權向鄉村的不斷滲透，鄉村變得日益凋敝和破產了。它打破了鄉村原有的寧靜與安詳，給其權力結構和文化生態都帶來了巨大的破壞。

集中到國家政權手中，以實現所謂「富國強兵」的目標。這種趨勢雖然沒有將民間組織完全驅逐出局，但畢竟將農村的自組織系統摧殘得七零八落，農村原有的互助、宗教、公益、自衛以及娛樂的功能大面積萎縮。(頁3)

在這裏，張鳴以一個學者特有的人文關懷對於鄉村文化之喪失表達了自己無限的哀婉之情。儘管筆者不同意張鳴對中國傳統鄉村社會的過於美化，但依然認同他對於近代以來國家政權向鄉村滲透的反思。應該說，張鳴的反思是深刻的，他點出了問題的癥結所在。在近代中國歷史舞台上角逐的各派勢力，為了使自身能夠立於不敗之地，都將手伸向了鄉村，通過從鄉村掠奪資源來維持自己的統治。當然，不可否認，一些個別的黨派勢力，在這個過程中也有富國強兵的抱負。但是，絕大多數的派別勢力都只是把鄉村當成了自己的金礦，不擇手段地加以開採，直到鄉村的最後一滴財源被榨光為止。總之，不管是為了實現富國強兵這一崇高理想，還是只為維護自己勢力範圍這一卑賤目的，所有的黨派勢力都是通過犧牲鄉村來完成目標，他們共同走了一條以犧牲鄉村來建立自己的原始資本積累的道路。至此，「清末以來的政權下移，終於走到了它不應該去的地方，脫離了原來的現代化目的，走到了其反面。」(頁53)

令人遺憾的是，張鳴教授的批評僅僅到1953年，而沒有討論新中國成立後三十年國家政權向鄉村滲

透所帶來的弊端。在真正意義上完全實現了國家政權向鄉村的滲透還是在新中國建立之後，其給中國鄉村所帶來的影響遠比晚清和民國時期更為巨大。1949年之後，在重建國家和地方政權的過程中，我們將國家政權推進到了社會的所有領域，所有政治、經濟、文化活動都在國家的控制之下。這種體制，一方面集中了力量，為國家恢復國民經濟，建立現代工業體系奠定了基礎。但同時，其僵化、落後的負面效應也隨着這種體制的逐步推進而愈發顯現出來。在經濟上，不能激發勞動者的積極性；在文化上，束縛創作者的手腳；在政治上，最終走向個人集權，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就是最為悲慘的教訓。

具體就鄉村而言，從合作化運動，到大躍進、人民公社，國家修了一條將政權延伸到每一個農戶大門口的路，鄉村的生活必須完全按照國家的意志來進行。而這一切只不過是為了貫徹國家通過犧牲農業來支持工業的政策。這造成了現今城鄉之間的巨大差異，對國家未來的長久發展產生了非常負面的影響。直到今天，中國依舊是「鄉土中國」。三農問題依舊是擺在中國人面前的最大問題。李昌平曾經大聲疾呼：「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本來，國家政權向鄉村的下移和滲透是為了解決國家所面臨的現實困境，其結果卻導致鄉村的凋敝這一更大的困境，其中的優劣得失不言自明。

如果要對近代以來的這種政權下移現象找尋其背後的思想動機，則是文章一開頭筆者所提到的那個

在真正意義上完全實現了國家政權向鄉村的滲透還是在新中國建立之後。1949年之後，所有政治、經濟、文化活動都在國家的控制之下。這種體制，一方面為國家恢復國民經濟，建立現代工業體系奠定了基礎。但同時，其僵化、落後的負面效應也愈發顯現出來。

追求富國強兵夢的「全能主義政治」思想在作怪。「全能主義政治」這一概念的發明者鄒讜先生說，全能主義政治在應付特定危機方面有其合理性，但是一旦危機解除，則應立刻放棄全能主義政治，否則後果將不堪設想。它會過份壓抑社會本身的活力，走向極端就會出現只有國家而沒有社會的嚴重後果，最終導致一個社會的停滯不前。從中國近代的歷史來看，通過實行全能主義政治的方法，我們的確挽救了國家危機，驅逐了所有侵略者，最終實現了國家獨立。然而，在1949年後，中國不但沒有放棄這一政治體制，反而進一步強化它，最終導致1949年後三十年曲折發展的命運。直到改革開放，國家政權從相關領域退出，重新釋放社會的活力，才實現了國家的繁榮。

本書雖然是由一篇篇的論文構成，但是在編排上，作者十分注意前後篇章之間的密切聯繫，經常在前一篇文章的結尾為下一個要論述的問題留下伏筆，因此，在整體結

構上給人以行散神不散的感覺。本書的敘述不僅有時間的維度，從1903年的清末新政寫到1953年的農村社會主義改造，梳理出半個世紀以來國家政權向鄉村滲透的發展脈絡，同時還有空間的維度，大至寫國家政權，小至寫一個土圍子，點面結合，既有關於國家層面的宏大敘述，也有微觀層面上的地方性知識，給人以很全面的感覺。同時，作者在寫到各派勢力對鄉村的權力滲透時，並不將鄉村看成只是被動地接受政權的滲透，作者還研究了鄉村基層精英的反抗和應對之策，比如作者對紅槍會的研究。這樣的研究思路能夠還原歷史的情景化特徵，讓人讀起來覺得很生動。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張鳴教授的獨特語言風格。正如作者所言，此書是介於學術研究與隨筆之間，因此讀起來並不生硬。張鳴教授既能寫高頭講章，又能講述老百姓的故事，所謂左手書學術，右手寫隨筆，既能深入，也能淺出，實在值得我們青年學子學習。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目錄

2007年4月號、5月號

第61期 2007.4.30

- 王俊生 第二次朝鮮核危機：評估與管理——兼談當前的中國角色定位
- 潘家恩 新農村建設的幾個關鍵字——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實踐舉例
- 王翔 從《天風》看中國激進基督徒的政治表達(1946-1949)
- 賈慶軍 也談列文森的《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

第62期 2007.5.31

- 杜應國 理性的聲音——汪小川《二鋪調查》四十五周年祭
- 周承人、李以莊 事實是一切評價的基礎——對黎民偉若干史實與評價的再勘誤
- 楊漢倫、夏芳華 當搖滾遇上交響——中國搖滾之父崔建及交響大師王西麟對音樂的回應之訪談錄
- 楊際開 評周昌龍《新思潮與傳統——五四思想史論集》